

辛亥革命史论文选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編

辛亥革命史論文選 下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

章开沅 陈祚津 陈辉

(一)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①五十多年以前，湖北的革命志士，正是把全国的和本省的局势这样联系起来认识，并且迅速走上艰苦斗争的革命道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从武昌打响第一枪，决不是偶然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都很不平衡。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中下游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而又压迫最深的地区，封建自然经济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比较迅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特别尖锐，江浙、两广、两湖因而成为进步思潮和革命运动最为发展的地区。湖北位居我国中部，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之一，也是清朝统治的重心之一，而各种进步思潮与革命力量又常常在这里汇集，因此很自然地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

到二十世纪初年，湖北已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后起的日、德、美等帝国主义也极力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掠夺。他们建立租界，掌握海关，兵舰游弋江上，教士横行内地，逐步控制了全

① 《湖北学生界》第一期《叙论》。

省金融、工矿、商业、交通等命脉。仅在武汉，外国各种企业即达一百八十家，其中英国五十三家，日本四十三家，德国三十五家，其他法、美、沙俄各十余家。应该指出，这些企业80%以上都是在一九〇〇年以后建立的。一九〇二年以后，汉口对外贸易激增，每年经常保持在一亿三千万两左右，成为仅次于上海而远超过津、穗的“东方芝加哥”。^①输入以棉纱等日用工业品为主，输出以茶叶、桐油等土特产为主，帝国主义疯狂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封建自然经济因为迅速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迅速解体，封建统治者不能不加快买办化，努力筹办所谓“新政”，以求适应这一局面。张之洞等创办汉冶萍钢铁公司、纱麻布丝四局和造纸、制布、针钉、毡呢、官砖等厂，同时还设立商务公所、商务局、商务学堂、两湖劝业场等机构，^②主观上是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统治，客观上却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九〇二到一九一〇年，武汉设立纺织、水电、面粉、火柴、机器等工厂二十四所，^③在工业发展上也仅次于上海。

武汉等少数大中城镇的畸形“繁荣”，建立在广大农村经济衰敝残破的基础之上；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更促使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在辛丑条约订立以后，“鄂省对中央之解款亦逐年增加。赔款岁派一百二十万两，补镑六十万两，练兵处调解五十三万两，辽东偿费五十万两，膏捐又夺归部办”。^④所谓“新政”也是个无底洞，一九〇九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奏称：“近以朝廷力

① 《夏口县志》卷十二《商务志》。

② 《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9—35页。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页。

④ 《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8页。

图自强，出款繁多，几骤过从前数倍。”^① 这些额外的支出，都化成名目众多的繁重赋税，强加在城乡人民身上。^②

适应于帝国主义建立商业高利贷剥削网的需要，湖北很多大地主直接兼营商业与银钱业。如襄阳杨姓地主占地四千亩左右，并经营钱庄和生漆等行业。他们除向农民勒收五成以上的租课和每亩数元的押租以外，还通过借“布袋账”、“棉花债”、贱买贵卖等方式进行残酷的高利贷和商业剥削。这就使得大批农民甚至部分中小地主破产失地，土地集中现象极为严重。以谷城这样的小县为例，拥有千亩以上田地的大地主竟达三四十家。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又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 and 导致水利的败坏。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天灾连年不断。灾民饥苦不堪，大批流入城市，如“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③ 农村人口的两极分化，造成城市人口的畸形膨胀；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加速了城市人口的阶级分化。“武汉三市的工厂，使用的职工数不下三万人。特别是百货集中地汉口，……苦力据说达九、十万人。”^④ 所谓苦力，主要是交通运输工人。这些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组成的失业、半失业者群（其中有一批是从湖南、四川、河南等地流入的），一部分补充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一部分投入新军队伍，^⑤ 但多数仍然求生无路，经常处于饥饿死亡的边缘。传统的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结社于是获得源源不绝的

① 《湖北通志》卷五十三，《经政》十一《新政》《财政》。

② 据《湖北通志》卷五十，《经政》八《榷税部分》记载：1901年以后，新增捐税有米谷捐、储备捐、洋油捐、火车捐、盐斤加价等等。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22、723、731、938页。

④ 《湖北官报》第二期，第1181—1182页。

⑤ 新军士兵最初需具备识字条件，但以后要求渐降低。据江炳灵回忆：“士兵成分多系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3页。

后备力量。

湖北地区从鸦片战争以来便逐步成为人民群众反抗中外反动势力斗争的中心之一。太平军三占武昌，四克汉阳，在湖北留下了深远的革命影响。具有反清传统的天地会当时已经成为太平军的重要配合力量。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以各种散兵游勇和交通运输工人为骨干的哥老会势力在长江和汉水沿岸获得更大的发展。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内地，而作为侵略工具的外国教会教士穷凶极恶，直接欺压中国人民，于是会党便成为反洋教斗争的急先锋。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湖北地区的反洋教斗争迅速推向最高峰，其中最著名的鄂西向策安起义，就是哥老会的支系江湖会领导的。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停止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转而通过清朝统治者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国内阶级矛盾显得极为尖锐，会党和其他下层群众的主要斗争锋芒又逐渐转移到封建统治者身上。

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湖北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也极不平衡。长江和汉水既是经济动脉又是政治动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势力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浪潮都很自然地汇集在鄂东武汉、武穴一带，鄂西宜昌、沙市一带和鄂北襄樊、光化一带。湖北人民的斗争长期以来早已形成了三个中心，并且与皖、赣、湘、川、豫、陕等邻近地区的人民斗争相互激荡渗透。^①在辛亥革命前夜，抵制美货运动、抗粮抗捐斗争、保路风潮和反清起义席卷武汉、宜昌、沙市、新堤、圻水、崇阳、武穴、沔阳、归州、宜城、

^① 张之洞在1900年秋天奏称：“……加以富有票潜入长江，勾结各路会匪乘机起事，武汉、宜、荆、黄沿江各属伏莽同时蠢动。襄阳、德安两府毗连河南之各州县，屡有豫匪闯入，与教寻仇。其宜昌之巴东、长乐等县，施南之建始、利川等县，又有川匪频思窜扰……。”大体上能够反映湖北地区人民斗争形势总的布局。《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一，奏议五十一，《借款充饷折》。

光化各地，声势极为浩大。

湖北各地的人民自发斗争给革命提供了雄厚的群众基础，而江浙、湖南、广东、四川等省的拒法、拒俄、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利等运动，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席卷川、鄂、湘、粤四省的保路风潮，更是声息相通，联成一片。作为全国革命大风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北地区的革命危机已经成熟。

穷困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各种城市贫民是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基本群众，他们在旧式会党的领导或影响下不断展开反抗斗争。但是他们不能制订明确的政治纲领，除了“反清”“灭洋”而外，提不出更为进步的斗争口号。分散性更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此起彼伏”四个字虽然是形容他们英勇地坚持了斗争，但同时也表明他们毕竟无从避免遭到反动势力各个击败的结局。会党成分复杂，容易变质，而且往往带有很大破坏性，不可能引导群众斗争取得最后胜利。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挺身而出，把群众的反抗斗争领导到新的革命道路上来。

数万产业工人，身受三重压迫，生活最为困苦，斗争亦最为坚决，而且表现出较好的组织性。汉口铜货帮三千多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克扣工资而罢工。一九〇七年汉口铜币局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定额而罢工。一九〇九年外商顺丰、阜昌等砖茶厂工人，为反对工头盘剥和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八九千人的同盟罢工，几乎形成暴动。在一九一一年保路风潮中，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亦曾举行“暴动”相配合。^①但是他们的反抗大多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往往利用落后的帮会组织，因此只能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辛亥革命。

^① 参见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第44页；又参见赵宗：《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二期。

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是进步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下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经常遭受衰败破产的严重威胁，因此也具有反抗的要求。他们曾经比较热烈地参加或响应历次的抵制外货和保路风潮等斗争，在新堤、南漳等小城镇，中小商人甚至还采取比较激烈的“罢市”行动来反抗苛捐杂税。但是，他们一般都与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在斗争中往往容易动摇退却。在二十世纪初年，武汉等极少数城市的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还非常幼弱，少数工业资本家始终未能形成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最发达的是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帝国主义进出口贸易的商业和银钱业，而支配资产阶级的则是银行钱庄经理和大商号的号东，买办阶级也非常有权势。^①这样便决定了武汉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特别软弱的特点，不仅其上层（如宋炜臣等）成为立宪派的社会基础，就是中小资本家也大多在上层控制下，不敢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在辛亥革命前夜，他们与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二十世纪初年，张之洞等在武汉和外县设立文高等（以后改为两湖总师范）、文普通、武普通、方言、农业、工业等各种学堂，又大量向日本和欧美派遣留学生（名额多于一般省份）；同时为了使“新军”更快地掌握新式武器和战斗技术，曾经专意招考识字士兵。当时封建知识分子正处于分化状态。科举废除了，不能不寻找新的出路；家庭没落了，更不能不急于谋求生计。张之洞这些措施吸引了大批本省和外省（主要是湖南）的知识分子。“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

^① 根据《夏口县志》卷十二所载汉口商务总会历届总协理表，从一届到四届，历任总协理共六人（有连任者），三人为银行经理，三人为大商号号东，而且都有候补道等官衔，其中刘歆生则是买办。又据同书所载汉口商务总会历届议董表，第四届议董共三十一人，其中银行、钱庄、票号经理十五人，大商号号东十人，洋行经理四人，大工厂主二人。

兵。”^①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本意是想造就一批忠顺而又得力的奴才，可是却使这些人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武汉地区资本主义比较发展，水陆交通比较发达，更为革命思想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知识分子尽管家庭出身各不相同，然而从其个人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政治立场来看，则大多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之中，除少数人依附反动势力以外，多数人经常遭受失学失业的威胁，处于迅速分化和极不稳定的状态。由于具有知识和见闻较广，他们在政治上比较敏感。民族危亡和谋生艰难促使他们迅速走上革命的道路。从湖北地区来说，留学生在介绍革命思想和宣传革命纲领方面贡献较多，而本地学校和新军中的知识分子则在具体组织与教育革命群众方面贡献最大，两者结合起来，很自然地成为革命的直接领导力量。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小资产者干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②不管这些革命党人自己喜欢扮演什么角色，“命运”使他们只能充当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天下的事物有时不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加强侵略，结果却促进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武汉和两湖这样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自然需要张之洞这样的“得力”统治工具；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兴办的“新政”，却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了自己的对立物。^③但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2—3页。

②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③ 有一个张之洞的崇拜者说得有趣：“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富，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观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张文襄公18鄂记》，第7页。

是，汉阳兵工厂的枪炮是不会自动向反动派开火的，为了在武昌打响革命的第一枪，多少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多少革命志士长期进行了艰苦而又比较踏实的宣传组织群众工作。

(二)

湖北革命运动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同盟会成立以后，更于一九〇六年派余诚回湖北设立分会，依靠日知会展开工作，开始与湖北革命运动建立了组织联系。一九〇九年春共进会在汉口成立，一九一一年夏中部同盟会建立湖北分会，同盟会对湖北革命运动的领导关系更为明确。所以在一般湖北革命党人的心目中，孙中山是公认的领袖，而三民主义则是共同的纲领。但是由于同盟会本身就很涣散，对于各个地区革命的领导往往很不及时，因此湖北的革命运动又带有相对的独立性。研究武昌起义和湖北革命运动，必须结合这个地区的某些特点，进行具体深入的探讨。

第一，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导思想是“革命排满”。

湖北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成立开始，即“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①以后日知会、群治学社、文学社等都没有另外制订什么新的政治纲领。共进会虽然自认为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可是却公然将“平均地权”改成“平均人权”。胡鄂公曾经回忆说：湖北的各个革命团体，“皆以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中华民国为唯一宗旨”。^②不管有些人怎样辩解，湖北革命党人只接受了“二民主义”确是事实。同盟会主要是通过留学生来领导湖北革命运动的，而共进会的主要领导人如邓文辉、刘

①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

②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31页。

公、孙武、焦达峰、刘英等都是地主豪富之家出身，思想上显然受到阶级的局限，因此他们在传播三民主义时便有意无意地撇开了较为急进的“平均地权”纲领。

在民族和民权两大主义的宣传方面，湖北革命党人“尤其注重‘驱除鞑虏’四字”，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只知反清革命而已”。^①“反清”本来在会党和其他下层群众中是一面传统的通俗的斗争旗帜，现在革命党人又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首先，他们把反清与爱国救亡联系起来。文学社的“宗旨仍系反清救国”。^②共进会宣言在历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之后，特别愤激地指责它“拿我们给洋人做三层奴隶”；并且明确地指出：“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送给洋人”。^③这种宣传和湖北地区影响最大的革命读物《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书的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其次，他们又把反清与建立共和联系起来。革命党人是把“满人”作为一个极端暴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化身来反对的。如共进会宣言除以很大篇幅指责清王朝的种族压迫以外，更明确指出：“他还要吃着穿着我们的哩！有时享受得不安分，他还要生许多事情欺虐我们。又放些贪官污吏，替他来收厘征税，……或者加一个罪名，还要断送我们的性命。”至于由湖北党人自己编印而又流行极广的《孔孟心肝》一书，则着重“辨明君轻民贵之关系，……而推广于共和政体”。^④不过除了外地传来的《猛回头》、《革命军》等书外，本地革命党人并没有着力宣传资产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2页。

② 潘康时：《记文学社》。《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54页。

③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二期，第96页。这是在《支那革命丛报》第二、三号合刊本发表的《共进会宣言书》原文，邓文举追忆所记者已经面目全非。李春萱逝世前曾致函作者指出其中颇多失实之处。

④ 梁钜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7页。

阶级共和国的思想，以致很多人仅仅从政权形式上来理解民主共和。

“革命排满”这一宗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 过分把一切民族灾难的根源都归结为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没有认真揭露帝国主义这个最凶狠的主要敌人，因而容易使人们丧失警惕，放松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共进会宣言虽然允诺在反满成功以后，“再来打算办那洋人的事”，可是却谆谆告诫下层群众：“切记不可损害他们（指帝国主义——引者），免得惹起大祸来。”显然已经流露出对于帝国主义的畏怯心理。2. 在很大程度上使种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一方面不能把满族统治阶级与一般满族人民严格地区分开，从而在革命中容易滋长某些极端有害的种族复仇主义情绪；一方面又没有把封建势力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来反对，因此又使人们放松了对于汉族地主阶级的打击和戒备。这些缺点在武昌起义以后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但是从“反清复明”到“革命排满”毕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表明人民的反抗斗争已经从旧式农民战争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同时，“革命排满”又是一个群众性极为广泛的口号。会党和其他下层群众热烈响应这个口号，因为这很接近他们的传统语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当然支持它，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提出的。甚至地主阶级反满派也容易接受它，因为这样的革命既打击了满族地主阶级而同时又不致损害自己的利益。当时，湖北军政和财经大权完全掌握在满族官僚瑞澂、铁忠、连甲等手里，他们残酷暴虐，人民恨之入骨。因此，革命党人就能够利用这个口号迅速团聚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反抗队伍，首先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武汉以至湖北的反动统治。

第二，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干队伍是新军士兵。

会党和新军是辛亥革命的两支基本队伍，但是各省的情况又

不完全一致，例如在湖南、四川等省会党发挥的作用较大，而湖北革命党人主要是依靠新军士兵赢得了起义的胜利。

早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便通过在香港召开的各派秘密会党联合大会，与湖北李云龙、辜鸿恩、辜人杰、师襄等系会党初步联合起来。^①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只是消极地利用，而不加以积极地改造，一遇失败挫折，往往单纯归咎于会党的散漫无纪律等缺点，转而对之采取厌弃的态度。在“自立军”起事失败以后，湖北一部分革命党人便得出“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的结论，^②“俱认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③这事实上成为湖北革命党人以后进行革命活动的基本方针。一九〇四年科学补习所成立前后，刘静庵、张难先等先后投身从军，从事瓦解旧军队和掌握革命武装的艰苦工作。至于“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送子弟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④这更给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当然，湖北革命党人也并没有立刻完全撇开会党群众。一九〇四年夏秋之间，科学补习所为谋响应湖南华兴会起义，曾经专门派人到鄂西荆宜、施南等处联络会党。一九〇六年成立的日知会，成员主要是军人和知识分子，但部分会员仍然在武汉下游和襄河一带联络“哥弟会”。^⑤共进会本来是专为联络会党、发动起义而成立的，一九〇九年焦达峰曾在汉口将名目分歧的长江各会党“特改

①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45页；《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45—146页等。

②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1页。

③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

④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9页。

⑤ 范鸿勋：《日知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78—79页。

为中华山以统一之”。^①此外刘英在京山一带，黄申芑在大冶、兴国一带都与会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可是他们感到会党“难于约束”，“屡次连络会党起事，都没有得到结果，所以共进会的革命运动遂转向新军”。^②一九〇八年以后相继成立的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几乎是清一色的新军中的革命组织。到武昌起义前夜，湖北革命党人可以说是集中全力在新军中活动。

在瓦解旧军队的艰巨工作中，也有过失败的教训。日知会曾经“专以发展军官为主”，革命活动虽然取得某些暂时的方便，但“缺点是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后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新军中吸收同志，专从士兵着手”。^③无怪乎以后有的革命党人竟说：“武昌起义实际上是湖北的士兵革命。”^④

新军士兵多系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和贫苦知识分子，而且一般入伍不久，旧军队的习染较少，他们本身具有比较强烈的反抗要求。革命党人参加新军，在军队内部把大部分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变反动武装为革命武装。这确是一条成功的经验。新军组织纪律性较好，湖北革命党人觉得比较容易控制；相形之下便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强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⑤因此便逐渐疏远了会党，特别是没有积极改造会党并通过它来更广泛而深入地发动农民群众；一般说来，新军与农民的联系比会党差，而作为反动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尤其难以成为发动农民的组织形式。这又给革命带来根本的弱点。

①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79页。

②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13—114页。

③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12页。

④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5页。

⑤ 《辛亥武昌首义记》卷上，第4页。

自然，也不能把新军与会党截然分开，会党参加新军和新军参加会党的现象都是很常见的。科学补习所即曾作为会党的“介绍入伍机关。当时所用密码，招兵曰‘货俏’，速派弟兄来曰‘办货来’，……”。^①以后黄申芑也是“以兴国、大冶会党首领的身分，加入新军”的。^②新军与会党始终有一定联系，例如鄂北光化、襄阳的起义就是新军士兵张国荃等与江湖会联合发动的。但是，多数革命党人放松甚至放弃对于会党的领导，毕竟使这部分群众基础相当广泛的社会下层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鄂北新军中的会党势力甚至有意撇开革命党人，单独策动起义。据襄阳的新军退伍士兵回忆：武昌起义前，新军中会党分子很多，但并不向革命党人暴露自己的身分。这种说法是合乎情理的。

第三，湖北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比较深入坚实。

湖北革命党人鉴于科学补习所因为会党泄漏机密而日知会的军官会员又不能坚持革命到底，因此决定专门对“士兵、学生痛下功夫”，非常注意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他们反对“轻率发难”，强调要使人们“真正认识革命而归依之”，^③因此又耐心地长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创造出很多可贵的经验。

他们从一开始就注意把公开的宣传和秘密的宣传结合起来。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在新军中一方面秘密散发革命书刊，一方面利用饭后讲故事等方式激发士兵反抗思想。日知会更利用帝国主义教会的阅览室，陈设进步书刊，每逢星期日则演讲爱国救亡之道，能够于数月后使“凡来听讲者，多醉心革命”，但同时也不放松暗中的个别联络教育活动。他们还在黄州设立秘密印刷所，翻印革命书籍，大量输入武汉各地。其中以《猛回头》、《警世钟》等小册子最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卷首《自序》。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14页。

③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81页。

为流行，因为通俗易懂，而且可以歌唱，各校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退伍士兵又常带至乡间，影响非常深远。

日知会宣传的吸引力很大，每逢星期演讲，听众有时多至千余人，对革命思潮的传播作出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过分偏重公开宣传，容易暴露身分，所以不久便遭到破坏。以后湖北党人吸取了这一教训，他们除利用社会影响更大的报纸（如《雄风报》、《商务报》、《大江报》等），继续进行公开的宣传以外，特别重视秘密在少数人中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革命教育工作。这些宣传活动一般都非常生动活泼，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如文学社宣传反清革命，则从“本镇各标营旗籍官兵，均系双粮双饷；其他一切享受，均在汉人以上”等切身感受讲起，然后再引申到“种族革命”、“救国救民”，对新进的同志启发很大。^①《大江报》更以士兵利益的维护者身分出现，“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以致声誉日起，销路日增，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的士兵群众；而一到保路风潮高涨，革命时机成熟，它便适时地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样极富煽动性的文章，促使革命群众的热情达到沸点，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此外，《大江报》还很注意培养和扩大宣传力量，“凡军队中之社员，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即登载，借以训练社员之胆识，而取得其同情，兼以坚其志”。^②这也是很可取的做法。

湖北革命党人在宣传工作中也很注意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配合正面宣传，如放映幻灯、编制歌曲、吟诗联句、讲故事、做游戏等等，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有些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已经超出了士兵和学生的范围。他

① 鲁祖珍：《第三十标辛亥首义事略》。《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90页。

② 潘康时：《记文学社》。《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第55页。

们曾乘新军调防的时机，在潜江一带饥民中进行鼓动；^①又曾秘密携带革命读物，潜伏乡间；“每值村镇演戏集会，虽远在数十百里外，辄徒步往，或杂人丛，或登台演讲”，宣传革命。^②还有少数党人深入工人中间展开宣传活动。如日知会破坏后，夏清泉、张纯一等“涸迹路工，时或运米，路为水淹，辄去长衫，肩囊赤足而涉；盖力矫腐朽之习，锻炼筋骨，以便接近众工也。工暇，则集工人讲个人、社会卫生等。且讲中国亟应改革一切之理由，听者莫不诩诩欲动”。^③这些可贵的活动使革命影响逐渐深入到一部分工农和其他下层群众中去，但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知识分子毕竟还不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真正结合起来。

切实的宣传工作为组织工作开辟了道路，湖北革命党人在组织工作方面也有很多可取之处，而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不断吸取教训，在摸索中前进。会党的传统经验、新军的组织系统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方法都是他们学习的对象，而最后又把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组织工作的特色。

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只有领导机关的职员，根本没有什么基层组织，入会手续也很随便，因此很容易在反动势力破坏下涣散瓦解。从群治学社到文学社以及共进会，组织系统都日益严密。他们的领导机构在社长之下分设文书、会计、评议等部，职员采取选任或推任方式确定，这是向同盟会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办法。社员按照标、营、队等单位推任代表，标代表会议决定革命布署，逐级领导，单线联系（各营之间不能发生横的联系），工作进行非常秘密。这样做，是根据迫切的起义需要，把革命组织与新军编制系

① 《辛亥武昌首义记》卷上，第11页。

②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34页。殷子衡也曾进行过类似活动。

③ 曹亚伯：《武昌日知会之破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584页。